

# 论职业教育被看作“次等教育”的缘由与对策

张祖夔

(浙江省教育厅 高教处, 杭州 310005)

**摘要:** 针对职业技术教育被视为“次等教育”的现状,从历史沿革与国际比较等多个视角,直面剖析产生这一现状的根由,追溯近20年政策引导上的缺位,并从转变教育观念,重新认识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价值,调整教育结构布局,改变人才培养模式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 职业教育;教育观念;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06)04-0316-05

##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eing Regarded as “Second-rate Education”

ZHANG Zu-ku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05,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regarded as “second-rate education” and from angl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origin that has caused the phenomena and traces the lack of policy guidance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 The author also puts forward the basic strategies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hich is quite valuable to the present-day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outlook; training model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在一次中外职业教育发展论坛上说:“现在市场的调节作用在中职教育领域似乎已经失灵。一方面‘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等消息频频见诸报端;另一方面家长、学生却仍然往‘小学到研究生’这条小路上挤,职业教育被看作次等教育。”<sup>[1]</sup>

张力所言甚是,大家也都觉得困惑。张力说到的三种状态:社会迫切需要的“技术人才严重短缺”、

急于求职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家长和学生仍然千方百计往“小学到研究生”这条“小路”上挤,形成了两个不对称:短缺人才与求职人才不对称,“大路”空与“小路”挤不对称。

严重不对称的危害已经显现:从人才培养来看,目前,全国城乡每年有上千多万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数百万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上百万大学毕业生不能及时找到工作。从经济社会发展看,

收稿日期: 2006-09-05

作者简介: 张祖夔(1937— ),男,浙江平湖人,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原处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前委员(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原副会长,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的管理及研究。

社会对各类技术人才需求量很大,一直供不应求;而国家经济发展由于技术人才和技术水平不足,经济质量提升受到极大制约。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工业增加值居世界第四位,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我国制造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由上学难到就业难,到招工难,到技术人才、技术水平不足,一直到制造大国难以提升为制造强国等一系列问题可以看到,职业教育已经不只是“次等”与否之争,而是必须从提高经济质量、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高度,加以足够重视,尽快抓紧抓好的大事。

## 1 职业教育被看作“次等教育”的缘由

职业技术教育在教育领域被看作“次等”,不仅广泛存在,而且时间长久,决非教育一界的事情。

### 1.1 沉积于人们心底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意识挥之不去

社会上人们总是喜欢当官员,不想当百姓;喜欢做白领、金领,不愿做灰领、蓝领;喜欢当技术员、工程师,不愿意当技工、技师。甚至考生报考大学也愿意报经济、管理类专业,不愿报考工、农业专业,他们的理由是学经济、管理的将来搞管理,指挥人,学工、农的将来搞技术,受人指挥。1997年高等教育结束大学毕业生组织统一分配,取消大学生的“干部身份”,单位进人无须要有“干部指标”。这本身就意味着以培养干部官员为宗旨的精英教育阶段的结束,转而开始为全社会培养各级各类技术实用人才的大众教育的确立,能够进入公务员系列的只占大学毕业生人数中的1%~3%。可是,8年之后,2005年公务员招考,报名参加考试人数与录取之比竟然为48比1,足见一心扑向“官员”“管理者”的意识仍是如此浓重。

究其实,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毕竟是中国社会发展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深层次意识。人类社会初期,生产力低下,劳动强度大;到社会发展到能产生“剩余价值”的时候,社会的一部分人可以从艰苦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他们成了社会管理者,他们掌握生产、生活资料分配权,他们有权让子女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从此社会就分成两部分人。几千年来每日艰苦劳动的“治于人”者或已经脱离艰苦劳动的“治人者”都希望自己能获得或保有这个“治人”的地位。直到现今,人们仍然只以当××长、××师、××家为荣,

而不敢以当××工炫耀。现今社会,由于对技术的热爱挂官而去的鲜有看到,放弃技术专长转而为官者屡见不鲜;因有技术专长而让他免官安心钻研技术者少,因科技有贡献而封赏一个官职或给一个“厅级”或“副省级待遇”理所当然。“管理者”与“技术工作者”孰轻孰重泾渭分明。

### 1.2 人们看重科学轻视技术的观念年久天长

在人之进化为人的时候,人就有了技术<sup>[2]</sup>。人类的技术已经有了千百万年的历史,生养和造就了人类本身,创造出灿烂的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进步。它是劳动者创造的,从事技术创造与操作的高手被称为“工匠”,技术的进步被称为“工匠传统”。

科学则发生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科学活动的早期是非体力劳动者的事情。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搞科学要有三个条件:“惊异”“有闲”“自由”。有“惊异”才能激发人们去探究事物的根本,“有闲”才有时间进行科学活动,有“自由”才能发表与众不同的研究结论(真正的科学发现一定是与前人结论不相同的),当时的劳动者根本无法得到这样的闲暇和自由。所以,科学前期的科学研究者大多出身豪门,至少他们不是艰苦的体力劳动者,中国外国无不如此。科学的起源与沿袭,被称为“哲学家的传统”。

因此人们总是看重搞科学而轻视搞技术。生活中谁谁谁是搞科学的就被尊崇,谁谁谁是搞技术的就等而下之。

### 1.3 高等教育传统理念根深蒂固

高等学校历来是培养读书做学问的人才领地,而把动手学技术视为“次等”。从我国古代到现代,从国外第一所大学创建以来,无不经历这个过程。从夏代开始的我国高等教育,就是以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为宗旨的,夏商周三代基本模式相同,秦汉以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贯彻始终,培养学生与培养官员互为表里。这样的精英教育,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新中国半个世纪的高等教育仍然沿袭这条道路走来,仍然是培养“干部”(行政22级与23级),到1997年才取消大学生的“干部身份”。在国外,最早的大学波洛尼亚大学(意大利)就是一个罗马法讲坛的衍生物,欧洲的早期高等学校创办无不取法于它。大学就是自由探讨学问,交流学术,培养学者的场所。培养读书做学问的人才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个传统。

欧美高等学校在欧洲产业革命之后,已经把培



养技术人才引入高等教育范畴,高等学校成为社会需要的高等技术人才的摇篮,但我国 20 世纪初期接受的西方高等教育仍然延续以学术为主的传统。苏联高等教育进入中国,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强调实践与技术的特点保留下来的不多。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崇尚的仍然是读书做学问的主流传统。这种传统深刻地铭刻在我们当代大学校长的意识深处,左右着我们高等学校的追求与发展,不管自身条件、环境需求,追求的仍然是专科升为本科,本科升为硕士博士的模式。同样,这样的传统模式在学生和学生家长心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他们的意愿,进学校就是读书,不是学技术,所由之路必定是“从小学生到研究生”。

#### 1.4 现行制度与政策的导引

我们的用人制度、评估制度与政策,十分强调学历、学位与学术头衔,这是一种有力的导向。政府以什么标准用人,大家就往你的标准上靠。20 世纪 80 年代重学历,从上到下爬学历,包括各级领导干部概莫能外;90 年代重学位,不论是否具备条件,各类研究生班风起云涌;新世纪重院士,千方百计跻身院士。今天推选一名领导或重要岗位负责人都要标明该人的学历学位,公布一任组织名单都要标明学历学位,甚至出身学校。一切升等升级都要讲究学历学位,在这样的潮流下,谁还会去埋头学技术呢?

对一个单位、一所学校的评估也有学历学位标准要求。譬如小学要进“重点”,就要求教师有多少比例的专科生或本科生;中学要上重点,教师要有多少百分比的硕士;职业技术学院师资队伍规定要有百分之多少的硕士,否则就不合格。而事实上这些从校门到校门的研究生对于培养技术人才的院校不管用。但是,正是这样的评价迫使人们去读学位而不去求技术。

#### 1.5 泛商主义对技术本质的扭曲

当前,把市场经济制度曲解为一切事物只要有钱都能办到的思想正在蔓延。他们认为,只要赚了钱,什么技术、高技术都能花钱买到。他们眼里钱高于技术,经商高于搞技术。他们完全扭曲了技术的根本价值,不理睬技术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力量的意义。我国古代重农抑商,阻碍了社会交流,不利于社会发展;如今无限崇尚经商,经商赚钱的富户受到多方保护,从事技术研究很难得到支持,发明成果常被人劫夺,同样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今天,这种泛商主义情绪泛滥,已经极大地阻碍了人们对技术

的追求和对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视。

## 2 主导管理缺位的检讨

轻视技术和技术人才培养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客观存在,需要通过我们的管理去引导才能得以转变。在我国,以政府为主体的教育管理始终是强有力的,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迟迟不能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追溯到管理的缺位。事实也正是这样,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曾经出现过两次重要机遇,可惜我们都失之交臂。

### 2.1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不到位

美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row)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的学说,于 1991 年被介绍到国内,并被广泛应用。但如何正确对待马丁·特罗的阶段学说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我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潘懋元教授及时指出:“引进的马丁·特罗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发展阶段论的思想,有助于拓宽我们的思路,预见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在实践中塑造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但我们还需化‘洋’为‘土’,建立起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框架,对洋人因袭之论作出富有挑战性的回答。”这里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理论框架”,而我们发现在引进这个理论之前,1985 年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恰恰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高等教育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决定》中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我们要为 90 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还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和新闻出版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党政工作者。”<sup>[3]</sup>

《决定》提出三个“造就”:一个“数以亿计”和两个“数以千万计”,尤其是后两个“千万计”是全面而



向社会经济建设的现代化人才需要,高等教育传统培养的党政干部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大众教育”框架开始确立。

在中央的《决定》中,有远见地指明了建设一支“劳动技术大军”是社会生产力的“迫切需要”,指出了“职业技术教育恰恰是当前我国整个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决定》还批评了“职业技术教育问题已经强调多年,局面没有真正打开”的现状。然而20年过去了,《决定》提出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发挥中等专业学校的骨干作用,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优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以及有本专业实践经验、成绩合格的在职人员入学,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局面至今没有出现。我们错失了1985年贯彻《决定》的机遇。2005年11月的全国职业教育会议,既是1985年《决定》的重温,又是新条件下的发展,我们不能再一次错失这次机遇了。

## 2.2 学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教育管理没有跟进

1988年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务实的农耕民族,也是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几千年的文明进步史就是一部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文明史。技术创造曾经使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强盛的国度。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早在16世纪,我国的GDP就曾达到世界GDP总量的1/3,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然而近30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技术文明式微了。就是在我们今天人都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知识”变臭了,“学术权威”打倒了,代之以无知的狂妄:“我们8亿中国人民,每人吐一口痰就能把帝国主义淹死。”邓小平能在“文化大革命”创伤刚刚有所修复的1988年提出了这样的论断,确实是振聋发聩的历史回声,是今后百年国家发展的指针。这一论断的发表,也正是我国高等教育调整格局的大好机遇。面对这样的机遇,我们没有敏感地抓住,调整我们的教育发展思路,把职业技术教育全面纳入高等教育范畴,把技术人才培养从培养“读书人”的传统中突现出来;而是依然故我,让我国高等教育仍然在传统的轨道上推进。我们再次错失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就如张力

所说的“家长、学生却仍然往‘小学生到研究生’这条小路上挤,职业教育被看作次等教育”。

追溯往事,展望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自身历史的回顾,或许会增加今后办事的智慧。

## 3 职业技术教育的回归与发展

在“学校”出现之前的生民教育,是人类在生活与生产实践活动中进行的生活、生产技能与道德教育,或者说是一种生存教育。这说明人类教育原本是大众的技术、技能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大众教育应该是生民教育在新的更高历史阶段上的回归。生民教育是为求得家族、部落、公社的生存与发展,大众教育是为增强国家的国力、国际竞争力,求得民族繁荣昌盛。生民教育与大众教育均以培养社会各行各业需要的合格人才为目的,有益于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技术(包括社会技术)是教育的中心内容。今天,为了国力强盛、民族复兴,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急需回归,更需要发展。

### 3.1 转变教育观念

求得职业技术教育回归和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转变教育观念。观念问题是职业技术教育被看作“次等教育”的主要根由所在。推动千百万年的人类进步的技术文明,几千年来被压到了社会的低层,要让人们重新认识它的重要价值,从而让社会再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但又是我们今天必须完成的任务。因而我们必须借重权威的理论指导,那就需要认真重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要学习和读解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和2005年11月全国职业教育会议文件,无论是教育的举办者、办学者、管理者、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应该在这里获得启迪,真正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们的教育改革。

### 3.2 调整发展思路

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前两者上下相接,职业教育则本身由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基础教育为公民教育,高等教育为高等专门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为职业技术人才教育。三者相比较,职业技术教育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最为贴近,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大计。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着眼点在于为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更多更好的技术人才和技术,因而必须抓紧调整教育结构布局,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为进一步建立从中等技术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到技术大学教育体系,调整发展导向、评估体系、招生政策,并增加职业技术教育投入,使职业技术教育出现新的面貌,使整个教育有一个改观。

### 3.3 改变培养模式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根本出路是培养的人才必须适销对路,使毕业生受到社会欢迎,脱离社会需求的职业技术教育绝无出路。因此,首要的是学校必须以自身专业方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社会需求,包括数量与规格以及专业的发展趋势等。在世界高技术领域长盛不衰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总是在经过一个时期发展之后,组织专家教授进行广泛认真社会调查,写出负责任的调研报告,然后调整人才培养和技术研究方向。为了“适销对路”,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必须有定期的严格的社会调查,以确保适合社会需求。

其次是培养模式改革。我们需要从事理论研究、科学发现的人才培养,但今天更需要强调技术人才培养。技术人才成长的规律并不完全等同于理论人才培养,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低,而企业需要的技术人才又难以找到,根本的接点在于是否“能

干”。理论人才培养要以读书研究为主线,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技术人才培养则要以技术训练为主线,强调实践联系理论。著名科学家塞缪尔·朗利与莱特兄弟几乎同时制作与试飞第一架飞机,自行车修理工莱特兄弟成功而塞缪尔·朗利失败,其原因就是莱特兄弟亲自实践而朗利雇人实践。技术人才成长自有其内在规律,我们必须研究这些规律,转变我们的培养模式。今天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尚需把教育部制订的“以应用为主线安排教学”原则进一步深化,形成既符合成材规律又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加以推广。

笔者认为,只有在职业技术教育得到重视,毕业生受到社会欢迎的时候,职业技术教育才不会被看作次等教育。

### 参考文献:

- [1] 沈峰. 职业教育为何被看作“次等教育”[N]. 工人日报, 2005-10-20(5).
- [2] 丹皮尔·W C. 科技史及其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 李珩,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7.
- [3] 瞿葆奎. 教育学文集第17卷: 中国教育改革[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797.